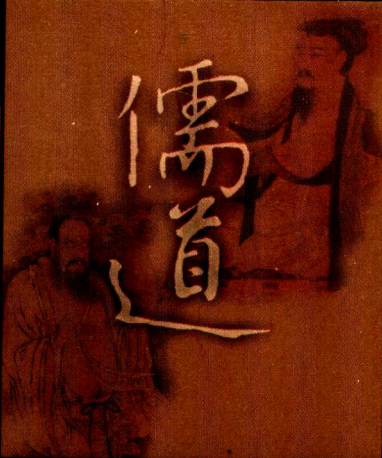




文化寻根丛书



刘学智 著

儒道哲学阐释



中华书局

“文化寻根”丛书

儒道哲学阐释

刘学智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道哲学阐释／刘学智著．－北京：中华书局，2002
ISBN 7-101-03524-8

I. 儒… II. 刘… III. ①儒家－哲学思想－研究
②道家－哲学思想－研究 IV. B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5694 号

责任编辑：陈 虎

“文化寻根”丛书
儒道哲学阐释

刘学智 著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1¼印张·273 千字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定价：20.00 元

ISBN 7-101-03524-8/B·356

序

张岂之

中国哲学与思想文化史，由先秦百家之学奠定了基础，儒、墨、道、法、名、阴阳，各有所长，在相互争鸣中，相互吸收，又相形见绌，到战国末期则出现思想交会融合的趋势。在秦、汉大一统的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墨学“中绝”，法儒合流，名家被肢解，阴阳家被儒、道吸收，后来凸显出来的是儒、道两家。汉代，儒家虽被定为一尊，但道家始终与其并存互补。汉、魏时期经由西域传入并得以初步传播的印度佛教，在此后的进一步发展中，又与儒、道并存纷争，形成三教交融的思想新格局，这一思想格局基本上持续到隋、唐五代。魏、晋玄学可视为儒、释、道三者相融的第一次重要尝试。而其深度地融合，终于导致了宋、明

理学这一儒学新体系的产生。所以,研究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不能脱离这一思想发展的主线,尤其应关注儒、道两家。

刘学智同志多年致力于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对儒、道、释三教皆有所涉猎,更着力于儒、道哲学的研究。这本书是他在多年研究和发表论文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通览全书,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作者对哲学研究方法论的思考。这样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如何解决在中国哲学研究中,既要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又要保持中国哲学自身特点的问题。作者认为,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研究和建构中国哲学体系,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不能回避的问题。有了新的参照系,我们才可以高屋建瓴地把握中国哲学。但是必须注意不能生硬地照搬西方哲学范畴来套解中国哲学的观念和体系,不能以西方哲学的既定模式剪裁中国哲学,不能脱离中国哲学特有的思维方式、特点和规律建构体系。他特别强调不能以西方的逻辑思维方式和概念系统来诠释中国的悟性思维方式和那些既具体又抽象的概念系统。在这一方法论基点上,他提出的“中国哲学没有不可知论传统”的观点、儒家“天人合一”不能简单诠释为“天人和谐”等观点就值得重视。二是对如何以恩格斯所说的“哲学基本问题”来研究中国哲学的问题。他认为,以“唯物”与“唯心”的对立思维研究中国哲学,要依据不同情况具体对待。以此方法对于中国哲学史上那些以“求真”为特征的自然哲学体系也许是适合的,但对于占主导地位的以道德心性为依归,以价值哲学为特征的哲学体系,则不完全适用。这对于长期以来在中国哲学研究中争论不休的一个方法论问题,即“哲学基本问题能否指导中国哲学研究”的问题,提出了颇有价值的看法。出于这种考虑,他对学界曾流行的以唯物和唯心对立的思维模式,对哲学史人物简

单地采取划线站队的做法提出了不同看法,并具体地应用于老子、张载、二程等人的思想研究中。三是如何正确把握中国哲学的价值形上学特征,如何坚守哲学的人文阵地问题。他认为,西方哲学的形上学是实体的或认知的形上学,中国哲学的形上学主要表现为价值的或境界的形上学;西方哲学是以逻辑思维方式为主,遵循的是“本体——现象”的运思范式;中国哲学是以直觉思维方式为主,遵循的是“本体——工夫”的运思范式,即主要解决道德的或精神的形上学与精神修养之间的矛盾。该书在具体地研究每一位哲学家及其体系时,都体现着他对中国哲学这些特征的理解,将其贯穿在多项专题研究中。虽然该书是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由于他多年形成了明确的指导思想,所以在研究儒、道哲学时,都尽可能采取中国哲学的话语方式,运用中国哲学自身的概念系统,关注中国人的问题意识,尤其注意体现中国哲学“体用一源”、“天人合一”等思维范式。这样的研究,应该说是有研究心得的,所涉及的也大都是一些较为深层的问题。

虽然该书研究的重心是儒与道,但作者并非孤立地去进行研究,而是将其放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以及哲学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进行。在古代,儒、道哲学与外来哲学文化发生的第一次大碰撞来自与佛教的交会。所以,作者对儒与佛、道与佛之间的相互冲突与交融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心性论:三教合一的义理趋向》一节,揭示出三教之间的融合与会通在义理上趋向心性论的基本走向,这为宋、明理学的心性学开拓了道路,做出了富于历史渊源性的解释。在近现代,中国哲学又面临着西方哲学与文化的冲击,这是中外文化的第二次大的交会。传统的儒、道哲学在总体上虽已解体,但其作为传统不仅仍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在社会生活中

也仍然有着深刻的影响。所以中、西的问题又凸显出来了。《中西融通：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一节，提出了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交融会通，将是中国哲学在世纪之交的基本走向的观点，文中特别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的诸多方法论问题。可以看出，作者的研究有着广阔的文化视野。

学智同志有着相当严肃的研究态度，这从该书的整理可以看出来。书中大多是作者近十多年来发表的论文，许多观点在当时都产生过一定影响，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但由于时间的推移，一方面，随着学术重心和问题意识的不断变化，新出土的文献也愈益丰富，也许有些观点需要重新加以认识；另一方面，作者的研究也在深化，有些观点也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这是合理的、无可非议的。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对有些自认为观点无误的研究做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充实，对一些需要深化的观点，为了尊重历史，作者除做了一些修改外，一般只在注释中作必要的说明和交待。例如，作者曾发表了数篇有关《老子》研究的文章，随着近年郭店楚简的出土，作者对先前的文章重又加以审视，并在注释中分别加以交待。这些都是严肃和负责的学术态度。

任何研究成果都不可能做到十分周全。由于该书是在多年研究论文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所以内在的联系就往往不能明显地表现出来，其中也不可避免的会有缺环，如对汉代儒学，书中就反映得不足，相信学智同志会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弥补。

2002年1月于清华大学

前 言

尽管人们对中国哲学中何者为“主干”的问题有着不同的说法,但没有人会怀疑儒家与道家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最主要的两个并存互补的体系。极言之,整个中国哲学史几乎可视为原始儒、道思想的诠释史。历史上对原始儒学的诠释,形成汉儒、玄儒、宋明儒几个有特色的阶段。对原始道家的传统诠释,也形成黄老、玄学及宋明道学几个阶段,同时也不应忽略道教系统的宗教化阐释。但真正对其思想进行科学的、客观的研究和诠释,则开始于现当代,特别是中国人有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武器之后。当然,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儒、道哲学的过程中,由于受“左”的思想干扰,也曾走过一段弯路,付出过代价。所以真正理性的、科学的儒、道哲学研究,始于1978年以后的近二十余

年,而我恰是在当年初才步入大学,而真正地学习和了解中国哲学则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加之自己早年的成长学习,又是在“要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文化环境下度过的,国学的训练本有一种先天的不足。好在“文革”之后,有了能静下心来读书和思考的社会环境,虽然未能“笨鸟先飞”,但可以尽力去“笨鸟疾飞”,把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都用于读书和研究。二十多年来,以一种既紧迫而又平静的心态,就这么一直走过来了。

克尼雅日宁说过,“读书有三种方法:一种是读而不懂,另一种是既读也懂,还有一种是读而又懂得书上所没有的东西。”这实际是说读书的三个层次。洛克也说过,学习的“诀窍”,“就是一下子不要学很多东西。”要急起直追,只能是选定目标,找准方向,有所为,有所不为。于是,我就从精读《论语》和《老子》及其历代不同系统的注疏开始,并尽量去努力领悟“书上所没有的东西”。所谓读懂“书上所没有的东西”,据我粗浅的理解,一是读懂“内蕴”,即明白其深层的东西;二是读懂作者的“弦外之音”;三是读懂作者想说而未说,或想说但还说不出,或读出作者应该进一步说但却未说的东西。第一种,也许就是如冯友兰所说的“照着讲”,而第二、三种,则是如其所说的“接着讲”。我以为,读书似应该在第三层即读懂“书上所没有的东西”上下功夫,这样才有可能在“照着讲”的同时“接着讲”。今天,就对儒、道二家的研究而言,就是既要沉潜于文献的挖掘,又要深入于义理的提炼,既不能迷失于细节之中,也不要悬浮于空疏之境。要在深入挖掘中国古代文献哲学内蕴的同时,尽可能与当今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特别是要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解决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解决好这一关系,我觉得就要处理好如张岂之先生所说的“三个结合”,即“思想

史与学术史的结合”；“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的结合”；“思想史研究与多学科的结合”。（《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这个“与多学科”研究的结合，也许还包括文化史的研究等。近年本人的研究虽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但先前应该说处理得并不好。

拙作形成现在这个样子，可以说尚未建立起严格的体系。依自己的学术研究状况，也出于我个人的一种考虑，还是主张如胡适所说的“多研究些问题”为好，不过他的后一句话可改成“少建构些体系”（虽然我曾在《中国哲学的历程》一书中，“建构”了一个“体系”，但自己并不满意）。不过为了叙述的方便，本书还是将多年思考的内容做了相应地安排，将其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为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思考，包括对世纪之交中国哲学走向等问题的探讨；第二章，主谈心性学说在儒家学说中的地位、影响及现代价值，同时也把与此相关的魏、晋“才性”问题的讨论置入此章，虽然它并不一定都属于儒学的范围，有的还体现着道家的精神，但这可从一个侧面说明心性问题在此一时期也有一定影响；第三章主论《老子》“道”论及道家的文化价值，对如何认识《老子》的现代价值提出了一些看法，对郭店楚简《老子》也做了一点评论。我以为，重视简本《老子》的研究无疑是对的，但通行本《老子》，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以此为基的、久远的、多维度的诠释史，影响中国文化和哲学发展两千多年，对它的研究仍然应该继续；第四章，对魏、晋玄学合一儒道的特征做了必要的分析，对晋、唐时期儒、道、释三教之间冲突、交融与会通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探讨，特别对晋、唐儒学学术思想的变迁、历史作用做了必要的叙述和分析；第五章，立足于关学，集中对源于关中而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重大影响的理学重要一支，即张载及关学的思想特征和关学宗风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对与之相关的

明、清实学的思想渊源和特征也做了相应的探讨；最后一章，综论心性论在唐、宋及明代三教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此外，本书另以两篇有关佛教研究和介绍的文字作为附录。

学术研究应该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丁是丁，卯是卯。希望大家发现和指出拙作的错误和不足，这无论对我本人还是对作为“天下之公器”的崇高的学术，都是非常有益的，况且我毕竟还有一段学术之路要走。

作者

2001年12月

目 录

序.....	张岂之(1)
前 言.....	(1)
第一章 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思考.....	(1)
一 从哲学的本性看中国哲学.....	(1)
二 世纪之交: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思考.....	(18)
三 中西融通:世纪之交中国哲学的主调.....	(32)
四 中国古代哲学没有不可知论传统	(41)
五 应在多维文化视野下治周、秦、汉、唐史.....	(58)
第二章 儒家哲学的心性论旨趣	(62)
一 儒家的“天人合一”:旨趣是道德心性论.....	(62)
二 孟、荀人性学说及其同异.....	(78)
三 名理学与魏、晋“四本才性”之辩.....	(92)
四 心性论与当代伦理实践.....	(103)
第三章 《老子》“道”论及其文化价值阐释.....	(117)
一 《老子》的“道”、“德”范畴系列	(117)

二 《老子》“道”论的逻辑矛盾	(128)
三 郭店楚简《老子》杂议	(141)
四 老子及道家学说的双重文化价值	(148)
五 老子哲学体系的二重性及其历史影响	(163)
六 如何认识老子哲学的现代价值?	(171)
七 老子“无为”的智慧与企业管理	(181)
第四章 晋、唐时期儒学与佛、道的交融会通	(187)
一 玄学合一:儒、道的社会历史根据	(187)
二 玄学“天人”新义与人生哲学	(191)
三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历史作用	(197)
四 两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振兴儒学的努力	(212)
五 隋、唐儒家学术思想之变迁	(223)
六 隋、唐时期儒、道、佛的纷争与交融	(231)
第五章 张载及关学的思想特征与宗风	(235)
一 张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思考	(235)
二 张载《横渠易说》中的“天人合一”思想	(241)
三 张载与二程哲学之关系略议	(252)
四 冯从吾学风初探	(257)
五 李二曲的思想特征:心学义趣,关学风格	(271)
六 从关中“三李”看关学宗风	(280)
七 明、清实学的思想渊源和基本特征	(287)
第六章 心性论:“三教合一”的义理趋向	(301)
附录 南传佛教概说	(313)
佛教空宗概说	(341)
后 记	(361)

第一章

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思考

一 从哲学的本性看中国哲学

任何一个民族性哲学,都具有哲学的本性,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由于人们在理解、诠释和建构本民族的哲学体系时,又往往以别的民族哲学作为参照系。一般地说,参照系本来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但思想的参照系则不同,它常常成为内在参与性和相互渗透性的东西,这就有可能使哲学的民族特征模糊起来,以致于有人会怀疑本民族哲学的哲学性。中国哲学在与西方哲学的交流与碰撞中,似乎就有这种情况。其实,如果从哲学的本质属性上探究,就会发现中国哲学是更合乎哲学本性的民族性哲学。

(一)哲学的人文本性和功能:寻求意义、确

立价值、启迪智慧、锻炼思维

哲学的本性是什么？从古希腊哲学家以来，人们就把哲学规定为“爱智”，它由“爱”(Philos)和“智慧”(Sophos)组成，即它不以某种知识性追求、传授为目的，而以启迪人生智慧为目的。“哲”，也作“悫”、“喆”，“哲，智也。”(《经籍纂诂》卷98引《尔雅·释言》)中国古代文献中将“哲”释为“智”、“大智”、“知”、“明”是非常普遍的，含有“智慧”、“聪明”、“贤明”等义，其对“哲”的追求，也蕴含着寻求人生意义、确立终极价值或追求心灵体验，提高精神境界的含义。后来所谓哲学，依其形上学的本性，其旨趣不在于“求真”性的认知，而在于内向化的建构人的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在于净化和充实人的心灵和构筑人的精神家园，在于精神生命的提升，按现在流行的说法，即解决人的“终极关怀”问题。它显然和科学认知有很大的不同。当然，哲学也有锻炼思维的功能，如恩格斯所说，为了“发展和锻炼”人的理论思维能力，“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

如果上述说法成立，可以说哲学的旨趣不在于“认知”而在于“反思”。冯友兰就认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①这虽然不能看作他是在为哲学下定义，但至少道出了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反思。哲学的思考与一般认知性的、反映论的思考是不同的，它至少有两个特点：一是它是总体性的思考，不是具体的、个别的思考，即要使思维突破个别、有限而达于普遍、无限；二是认知性反映是对当下客体本质及主体自身能力的思考，力求达到主、客体的统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册，第9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修订本。

一。而反思性思考,它要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对前提进行不断地、终极性地或者批判性地追问。我们通常所说“上升到哲学层面”,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这种反思,也是从现实出发的、根源于现实生活的。哲学不同于科学,一切科学作为对外部事物的本质揭示,都是反映论的而非反思性的。哲学不再是以描述的方式去客观地再现对象性规定,而是或以逻辑的方式(如西方)、或以直觉的方式(如中国)呈现存在者何以存在,存在的根据是什么。有学者把人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分为三个:自然世界、文化世界和意义世界。如果这种划分是合理的,那么,哲学就主要是属于意义世界的东西。哲学视域中的个体存在,不仅是物质的存在,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和意义的存在。反之也可以说,价值仅存在于人这一主体性生命形式自身。可见,哲学是根源于现实生活的,是为人类提供意义需要和解决终极关怀问题的理论体系。如果把哲学与科学等同或混淆,就有可能把哲学反思降低到形而下的科学反映的层次。^①

人们对哲学本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我们知道,古希腊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一切问题的探究几乎都包含在哲学之中。例如,宇宙论问题就曾是由哲学家来回答的。中世纪之后,各门具体科学逐渐从哲学中分化出去了(大概思维科学是最后分化出去的学科)。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慨叹哲学已到了失却自身研究对象的境地。当代有一个作家说:什么都干不了,就当作家吧。而哲学家也许会更有资格说:什么都做不了,就当哲学家

^① 通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常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定为“关于自然、社会、思维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如果我们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哲学,那么,这一提法就值得进一步商榷。

吧。其实,哲学一步步将科学剥离出去,不是哲学失却了自己的研究对象,而是真正找准了自己的对象,或者说回归到本来意义上的对象,哲学的面目不是模糊了,而是更清楚了。当代西方一些学者,也已注意到现代西方哲学由科学世界向人文世界、从自然——知识世界向文化——价值世界转变的动向,也说明了哲学向人文和价值回归是一种趋势。

在哲学史上,对人的意义和价值的哲学反思,总是从对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地位的思考开始的,所以这种反思又总是与存在问题的思考联系在一起。对存在的反思,在哲学史上形成了“本体论”问题。关于如何把握本体的问题,形成了哲学认识论问题。哲学认识论不是限于研究反映论本身,而是包括对反映论这种认识的再认识,“对于认识的认识,就是认识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认识之,这就是反思。”^①因为它探讨的不是如何认识具体事物,而是要超越经验世界、经验性存在,使人的视野从个别、有限进入到普遍、无限。对普遍、无限的追问,必然要超越经验和实证的视野,这就成为哲学的追问。哲学所追问的存在,是终极性存在,而这种对终极性存在的追问,又总是与人生意义的探究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所追问的终极性存在,是经验无法把握的、实证无法达到的。于是哲学认识至少限入两种悖论:一是本体不能用语言来把握,又不能不把握;“无限”不可描述,“不可言说”,又不能“不言说”,遂产生本体与语言的矛盾;二是理性在对存在的追问中,必然涉及到人的认识能力和知识问题,对认识能力和知识的追问就可能导向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册,第9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修订本。